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主编：王运熙 选注：王水照 聂安福

苏轼卷

中国工人出版社

新选新注

唐宋八大家书系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苏 轼 卷

王水照 聂安福 选注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苏轼卷/王水照, 聂安福选注.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6

ISBN 7-5008-1913-7

I. 新… I. ①王… ②聂…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宋代
IV. I 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744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兴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4.875
印 数	1~5060 册
定 价	18.00 元

总 序

王运熙

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历史上，唐宋散文，特别是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八大家散文，无可辩驳地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承秦汉古文的朴素自然而济以条畅，弃六朝骈体之繁缛雕琢而有所酌取，形成一种很适合于表情达意的新文体，这种文体长期为后世所颂扬，并被视为散文创作的典范。

最先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人合在一起，并予以大力推崇的是明初人朱右。他以八人文备三才之道，适万汇之宜，彰善制恶，褒是去非，可以为后世法式，故汇编其作，成《八先生文集》。嘉靖、隆庆年间，唐顺之竭力推崇唐宋散文，选先秦至宋文章为《文编》，于这一时期也标举韩柳欧苏等八家，并用以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秦汉古文派抗衡。稍后有茅坤服膺唐氏之论，遂专取韩柳等人文编成一集，径题为《唐宋八大家文钞》。由于唐顺之等唐宋派的提倡，《文钞》选录也较得当，其评语足为初学门径，流传颇广，“八大家”或“唐宋八大家”之名由此广泛传扬，他们的文章也因此家弦户诵，成为人们学习模仿的对象。

中国的散文，在先秦西汉时期，语言一般朴素自然。至东汉，

崇尚骈偶的骈文抬头。此后魏晋南北朝隋代，骈文日趋发展昌盛，除重骈偶外，还讲求辞藻、声律、用典等语言美。在这段时期内，骈文在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期内骈文也产生过不少长于抒情写景、语言美丽的佳作，但因过分重视形式，束缚过大，影响了散文抒情达意的功能。当时虽有少数人起来批评和反对骈文，但均未奏效。至唐代，社会上流行的文体仍为骈文。唐代前中期，出现了若干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散文家，如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元结等，但因才力不足，认识上也有偏差，因而成就均不很突出。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才从根本上动摇了骈文的统治地位。

韩愈少从伯兄韩会游，为梁肃及萧颖士子荐所赏识，与李华从子李观结为至友。前辈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无疑对他产生过影响。在此后长达数十年的文学实践中，他用很大力气来提倡古文。基于正在走向上升的庶族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热情、社会理想和政治视野，他明确提出修辞明道的主张，认为作文正需师古，词必已出。词不管难易，唯求其是。文章必须是内在志气充沛的表现，所谓气盛而言宜。与此相联系，他还认为大凡不得其平而鸣的作品，尤有真实情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提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之说。由于他行文能自树立，不但立意深刻，议论精到，且能兼采先秦汉代各家之长，自铸新词，风格浑灏宏肆而不失多样化，因而在散文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就。韩愈广事交游和招收弟子，传授古文，当时跟从他写作古文的士子颇多，古文创作在当时形成一种相当大的潮流。

在此期间，柳宗元的功绩也十分巨大。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重视文章的明道作用，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基于进步的哲学

观、社会观，他还提出辅时及物为道之说。他重视作家的修养，重视认真揣摩和学习古人文章，于儒家经书和西汉古文外，兼取诸子散文和《楚辞》，主张“有乎内而饰乎外”（《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临文以敬，旁推交通，使他的散文别具一种隽永的魅力。如果说韩文气势宏肆，不可控驭，他则峻洁幽深，滋味醇厚。又由于他与韩愈一样，也与一时古文家如刘禹锡、吕温、韩晔、吴武陵等人相往还，他虽谦称才能勇气不如韩愈，故不为人师，实际上还是努力奖掖后进，当时后学之士追随他学习的颇多，经他指点，为文都有法度。所以，他之成为古文运动的又一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他与韩愈虽在政治主张等诸方面不尽相同，但在为人、为学上彼此钦敬，各自对对方的古文成就有很高的评价。由于领袖人物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和明确的理论主张，有一批追随者积极响应，一场以儒学为旗帜，以复古为号召，以文体改革为中心，同时在深层意识中有维护唐王权统治为目的的古文运动，遂演成相当巨大的声势，韩、柳两家散文也由此被人奉为古文的典范。

中晚唐时代，在韩愈影响下，出现了李翱、皇甫湜、孙樵等古文家。但他们的成就均不及韩柳，有的更是一味求奇，使文风陷入晦涩而缺乏号召力。晚唐五代以迄宋初，仍是骈文势力强大。在宋初文坛占主要地位的是以杨亿为首的西崑派，其诗文均崇尚骈偶，文辞华艳。宋代前期，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出来反对浮华文风，均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直到欧阳修出来，不但摒弃“西崑体”，反对六朝以迄唐代的崇尚骈俪声律之文体，还注意克服倡言古文者好为怪僻之语的“太学体”，取韩文为范式而兼采骈文，以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同时，他承韩柳重道之说，以为道胜文至，但又极重视散文创作自身的文章特点，不抹杀古

文的独立地位。由于他凭藉贡举的优势地位，作有倾向性的提倡，使浮艳文体一时失去市场，以怪僻知名者也黜落殆尽。他还以独到的眼光，敏锐地发现如苏轼父子这样的人才。经过欧阳修的提倡和主持风气，文风变而趋于复古，而这复古与韩愈一样，是以复古为革新。

当然，苏轼父子及王安石、曾巩等人的理论响应，特别是他们的创作实践，也是促成宋代散文革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在欧阳修的指导下，在上述诸大家的积极响应和配合下，新一轮的古文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经由宋代六家大力有效的提倡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欧阳修、苏轼突出的创作实践，一种新的古文观得以确立。一方面，它继续崇信韩愈所标举的儒家之道，同时注意赋予这种道以更广泛的现实内容，使之“周万事之理”，“适天下之用”（曾巩《南齐书目录序》）；另一方面，更重视古文独立品格的实现，既要求它事信而载大，又要求它有自然流畅的审美品位。在这种古文观指导下，诸如欧阳修的条畅绵邈，苏轼的雄肆通脱，苏洵的驰骤博辩，还有曾巩的平正婉雅，王安石的简洁峭拔，苏辙的冲和澹泊，皆各逞其姿。他们以这种自然平实又深切著明的新文体来言事论政，谈兵议学，记叙山水，宣泄性情，既不完全排斥骈偶藻绘，但又不苛求属对精切缜密；既不排拒详赡博达，但又截然无取繁富冗长，不明体要。并且，比之韩柳等唐代古文家，他们的散文指事析理，更求洞彻，写景抒情，每趋清畅。倘若说，唐人作文更重字句的锤炼和气势的营建，他们则更多地用平易流畅的语言，从容不迫的节奏和体调，造成一种清新明朗的风格。在此过程中，他们对虚实字的研究和运用，对创作技巧、手法的探索和总结，对古文本身体式的创设和拓展，都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古文在他们手中，确实达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

唐宋八大家在散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上所述是巨大的。无论是从散文的理论建设来说,还是从实践积累来说,它都给后人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为后代散文创作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韩、柳古文理论和创作是欧阳修等人再兴古文运动的精神榜样自不必说,即以八家散文对后世历代文人的影响而言,也是十分深远的。元明清时代,虽有一些人无取乃至排斥唐宋古文,以秦汉文为至上的样板;还有一些人则更以复兴骈文为职志,排斥一切散体古文,称“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后》),但在明代自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到“公安派”、“竟陵派”作者,大抵都是沿韩柳及欧苏古文一派而取得实绩的。清中叶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以及后起的梅曾亮、恽敬、曾国藩等人,也是从八大家古文中得到无穷的滋养,其沾溉来叶,垂范后昆,厥功甚伟。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编选了这一套唐宋八大家书系。所选篇什大抵录自各家别集,大多数为当日及后世有定评者。它们既体现了八家古文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又关涉唐宋两代整个散文创作的发展关键和主体。限于篇幅,尚有一些佳作未能悉数选入,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前 言

王水照

苏轼是北宋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巨人，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方面均有建树，同时在散文领域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的杰出的散文作品标志着从西魏发端、历经唐宋的古文运动的胜利结束。他和欧阳修一起，建立了一种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散文风格，并作为有宋一代散文的成熟而稳定的主体风格，在中国散文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1037），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他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礼部进士试，嘉祐五年（1060）应“制举”（一种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入第三等，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卷入北宋多起政治斗争的漩涡：先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后又与司马光为首的反新法派有龃龉，同时还不满于程氏（程颢、程颐）之学的矫饰和繁琐，以致形成“洛蜀党争”（程氏兄弟是洛阳人）。因而仕途坎坷曲折，屡遭贬谪。一是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身罹北宋最大一场文字狱的迫害；一是晚年被贬至当时蛮荒的岭南

(惠州)和海南(儋州),长达七年。后蒙赦北归,不久就在常州去世。

在体现共同的主体风格的基础上,苏轼的散文又以雄健奔放、挥洒自如为特色,区别于其他宋代散文家。正如他自己在《文说》、《与谢民师推官书》中所说:“吾文如万斛泉源”喷薄而出,“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是兼擅众体的古文大家,政论和史论,记、传和书序,以及杂记、书简、题跋等随笔小品,不论抒情叙事,都表现了这一写作特色,成就卓著。

苏轼的政论和史论,主要集中写于初入仕途时期。他在应“制举”时所写的《进策》、《进论》等系列论文多篇,总结历史教训,分析当前形势,研究治国之策,反映了他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和对形势发展趋势的洞察力。这些虽不是纯文学散文,但苏轼饱含政治激情,旁征博引,巧譬善喻,写得迂回往复,波澜层层而又主旨集中,一气呵成。如《教战守》、《决壅蔽》等就是其中有名的篇章。苏轼的史论,则在文从字顺、论辩滔滔之外,又有喜作翻案的特点。如《留侯论》,对黄石公赐书张良的故事,一扫其神奇乃至迷信的色彩,回到人事上来找原因,发前人所未发,耳目一新,颇具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面貌。

苏轼记、传和书序一类以叙事为主的文章,比其政论、史论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他的亭台堂阁记,打破一般先叙事、次描写、后议论的格局,三种成分按主题展开的需要而错杂使用,变化莫测。如《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等篇,主旨相类而结构却不雷同,三种成分的配置各极其妙。有的记更对这种文体的传统框架多所突破。如《石钟山记》、《李太白碑阴记》都可以看作特殊性质的议论文。前者是辨误,后者是辩诬。前者以

考求石钟山命名原因为线索，偏重于议论，但中间一大段却是神采飞动的记叙描写，又与前后议论融为一体；后者从“气”、“识”两端为李白随从永王李璘辩白，却多用引证之法：引李白的具体行动，引夏侯湛的评语等，丰富了“记”这种文体的表现手段。他的传记类（包括祭文）作品，也常常突破文体的局限，体现了灵活多变的创作个性。如《方山子传》、《郭忠恕画赞》等，撇开对传主生平的介绍，只抓住传主的几个细节来展示其狂放的主要性格特征，笔墨简省而形象生动，达到了很高的文字工力。《祭欧阳文忠公文》、《祭陈令举文》等哀祭文，都没有平铺直叙地颂扬他们的功绩和成就，而是伴随俯仰呜咽的沉痛哀感，逐次展现他们的生平行实大节，表达作者对他们的独特评价。苏轼的书序类文章，写法也不拘一格，《范文正公集叙》、《王定国诗集叙》等，或叙人物，或论文学，也是为世传诵的名篇。

苏轼的随笔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在提高我国古代散文的文学性和个性化程度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较多地选录了这方面的作品。他的随笔小品大都作于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期。其文学样式主要是杂记、题跋、书简，其构成因素有议论、叙事、抒情，其写作特点是信手拈来，随口说出，追求自然为文，绝少藻饰，而其总的内容是凸现一个历经磨难而旷放豁达、富有生活情趣的心灵，是他性格的升华，思想的结晶，或者说，用自然无华的小品，写出了真率无饰的人品。他的记游文字，如黄州时期的《书清泉寺词》、《记承天寺夜游》、《记游定惠院》，惠州时期的《记游松风亭》、《游白水岩》、儋州时期的《书上元夜游》等，都善于表现对自然景物的赏会和对人生哲理领悟之间的融合。他的书简，如《答秦太虚书》、《与侄孙元老》、《与谢民师推官书》等，或叙身边琐事，或抒人生感叹，或述艺术见解，娓娓写来，亲切

有味，字里行间总有一个活脱脱的坡公在。其题跋如《画水记》、《书临皋亭》、《书〈归去来词〉赠契顺》等，内容丰富，都是散文中的艺术精品。苏轼随笔的另一个特点是多雅谑。读他的这类文字，总会感受到谐语戏言层出不穷，迎面而来，处处闪耀智慧的光芒。但他的谐趣是有着思想、哲理、感情的深度的，这就不同于一般的幽默，更区别于浅薄的油滑。有时，他把谐趣当作迎战厄运的武器，使得他在困境中履险如夷，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与参寥子书》中关于惠州杭州居处不殊、或贬地京都不无有病的议论，《试笔自书》中关于天地、大九州，中国皆在“岛”中的奇想，蚂蚁附芥的妙喻，《记游松风亭》中对于“就林止息”的感触，《书上元夜游》中对于“游”“睡”得失的探索，都在满纸谐趣之中显得意绪超越，表现出他对人生思考的独特视角，深刻地阐发了他随遇而安的旷达的人生态度。有时，他用谐语戏言来烘托其感情的真实和强烈。如《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中，大半篇幅写了和文与可之间的戏谑琐事，最后还用了曹操与桥公戏语誓约的典故，有力地映衬出他和文与可友情的真挚无间和悼念死者的悲哀之深。

还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对传统“赋体”的革新和发展。赋体原属韵文系统，从《楚辞》的“骚赋”，经两汉的“辞赋”、魏晋时的“骈赋”，直到唐代“律赋”的曲折发展，赋体似乎走到了尽头，创作颇为沉寂，形容也趋于偏枯。发展到宋代，逐渐走向散文化，但仍适当运用传统赋的铺张排比的手法，讲究词采，杂以骈偶韵语，成为一种类似散文诗的赋。欧阳修的《秋声赋》就是最早的成功范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也兼具诗、文之长，融抒情、叙事、写景、说理于一炉，是光照千古的不朽杰构。他的《黠鼠赋》也是一篇别开生面的寓言赋，向来被《赤壁赋》所掩而不为

人注重，实则对“黠鼠”形象的逼真描绘，说理的精微透辟，都有独到之处。

苏轼的散文在当时和后世都发生过巨大影响。在他生前，他的包括散文在内的作品就驰名遐迩，甚至在边缘地区乃至辽国、高丽等地都广为流传。他死后著作曾遭禁毁。南宋高宗时苏文又大为盛行。陆游说：“建炎（宋高宗年号）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犹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老学庵笔记》卷八）到孝宗时，更形成“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宋赠苏文忠公太师制》）的盛况。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是向光宗进呈的苏文选集。明代茅坤编选的《八大家文钞》，包括苏轼文钞，也是士人们争相诵习的重要选本。苏轼的随笔小品为明代公安派袁宏道等所师法，以实践其“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在清代袁枚、郑板桥的散文中也可看到苏轼的影响。

本书选录苏轼各种散文共一百六十篇，并按写作先后顺序排列，其中有少数篇章的写作时间未能确定，则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暂放在适当篇目之后。选文的个别文字，在各种版本中略有出入，我们择善而从，没有一一说明。选注工作中或有缺点和错误，诚恳地欢迎读者批评和指正。

目 录

总 序	王运熙
前 言	王水照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1
上梅直讲书	5
滄溟堆賦(并叙)	9
屈原庙賦	12
南行前集叙	15
礼以养人为本论	17
决壅蔽	20
教战守	26
贾谊论	31
留侯论	35
论养士	39
论周东迁	44
喜雨亭记	49
凌虚台记	52
思治论	55
亡妻王氏墓志铭	63
四菩萨阁记	65
上韩魏公书	68
谏买浙灯状	71

上神宗皇帝书	76
净因院画记	106
跋文与可墨竹	108
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110
牡丹记叙	113
墨宝堂记	115
墨妙亭记	118
记欧阳公论文	121
祭欧阳文忠公文	122
钱塘六井记	125
书游灵化洞	129
钱塘勤上人诗集叙	130
密州谢上表	133
盐官大悲阁记	136
后杞菊赋	139
超然台记	142
盖公堂记	146
李氏山房藏书记	149
晁绎先生诗集叙	153
宝绘堂记	155
思堂记	158
日喻	161
稼说	164
黠鼠赋	167
表忠观碑	170
放鹤亭记	175
灵壁张氏园亭记	178
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	182

祭陈令举文·····	186
文与可飞白赞·····	188
与言上人·····	190
秦太虚题名记(并题名)·····	192
与参寥子书·····	195
与王元直·····	197
答毕仲举·····	199
与李公择书·····	202
答秦太虚书·····	204
答李端叔书·····	210
画水记·····	214
石氏画苑记·····	217
方山子传·····	220
雪堂记·····	223
书游垂虹亭·····	229
答陈师仲主簿书·····	231
书清泉寺词·····	235
黄州上文潞公书·····	237
怪石供·····	241
后怪石供·····	244
赤壁赋·····	246
后赤壁赋·····	251
与蔡景繁书·····	254
二红饭·····	256
书刘庭式事·····	257
与范子丰书·····	260
记赵贫子语·····	262
书孟德传后·····	264

郭忠恕画赞(并叙)·····	266
记承天夜游·····	270
书临皋亭·····	271
与范子丰书·····	272
与徐得之书·····	273
题杨朴妻诗·····	274
钱子飞施药·····	275
口目相语·····	277
三老人论年·····	278
桃符艾人语·····	279
螺蚌相语·····	280
乌说·····	281
书蜀公约邻·····	283
王定国诗集叙·····	284
书黄子思诗集后·····	287
记游定惠院·····	290
赠别王文甫·····	292
再书赠王文甫·····	294
黄州安国寺记·····	295
自记庐山诗·····	298
石钟山记·····	300
二措大言志·····	304
答贾耘老书·····	305
书吴道子画后·····	306
答张文潜县丞书·····	308
王安石赠太傅·····	311
与杨元素书·····	314
司马温公神道碑·····	316